



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

秘书长的说明

目录

	页次
一. 背景	2
二. 导言	3
三. 幸福和福祉的方方面面和衡量尺度	4
四. 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行动	4
A. 国家行动	5
B. 区域倡议	8
C. 联合国系统的各项倡议	9
五. 国际和区域对福祉情况进行的主要调查及结果	11
六. 国际社会对福祉看法的分歧	13
七. 结论和建议	15



一. 背景

1. 大会题为“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的第 65/309 号决议意识到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确认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本质上并非旨在反映、亦不能充分反映一国人民的幸福和福祉。因此，大会邀请各会员国进一步制定能更好地体现追求幸福和福祉在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措施，以指导其公共政策。邀请那些已主动制定新的指标和采取其他主动行动的会员国向秘书长通报有关情况，以此为联合国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2. 大会还邀请秘书长征求会员国及有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对追求幸福和福祉的意见，并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通报这些意见以便进一步审议。作为对照会的回复，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收到了一些会员国和联合国各实体的来文，其中说明了在国家和区域两级所实施的幸福和福祉举措。除了提出这些举措外，本文件还介绍了幸福和福祉研究的现状，并重点说明了可能的政策影响。在这些领域特别重要的事项有：(a) 更好地将社会和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探究经济政策的社会后果；(b) 可持续发展问题；(c) 结合可持续发展指标，制订完善的幸福指标。

3. 将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作为发展目标的作法一直受到质疑。特别是，仅凭收入计量贫困状况不足以评估真正的贫困水平，因为贫困水平还涉及其他因素，如缺乏基本服务、歧视和社会排斥。此外，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经常强调经济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分歧和对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缺乏监测。最后，可持续发展和幸福指标的设计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视。

4. 特别是，秘书长在 2012 年 4 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幸福和福祉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对于仅以财富作为成败的衡量尺度，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委员会)的 1987 年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见 A/42/427, 附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的几份《人类发展报告》和 2008 年在法国政府的倡议下成立的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都提出了质疑。此外，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建议创设可持续发展指数，即衡量可持续发展方面进展情况的一整套指标。为掌握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情况，需要采用新的经济模式。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题为“我们期待的未来”的成果文件中，会员国认识到，为了改善决策的依据，需要有更加广泛的进展情况衡量尺度，作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补充，为此，我们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与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和其他相关组织协商，以现有倡议为基础，在该领域推出一工作方案(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38 段)。

二. 导言

5.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关切，经济业绩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足以衡量社会和经济福祉。正如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会所指出的：

我们的计量系统应将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移到衡量人的福祉。福祉的衡量尺度应置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强调福祉是很重要的，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总体数据中包含的信息与百姓福祉的重要因素之间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¹

6. 然而，通过衡量福祉和幸福状况来为国家政策目标提供参考的重要性受到质疑，因为这些概念往往被看作是主观标准基础上的个人追求，而不是国家政策问题。对于如何衡量幸福和福祉，如难以衡量人际比较状况，或存在适应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已经习惯一无所有的状态，尽管他们一无所有，但仍报称自己达到了平均幸福水平。此外，“幸福调查”的多数结论通常是基于西方教育程度较高、富有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提供的信息。这限制了调查结果的可信性。此外，民众的愿望和标准会发生改变，个人的幸福点可能不同。此外，对于把幸福看得过重也存有疑虑，因为在很多地方，困苦、贫穷、疾病、战争和犯罪普遍存在，专注于幸福似乎是一个奢侈品。² 因此，满足基本需要常常被看作是总体幸福感的先决条件。

7.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追求幸福仍是许多国家宪法规定的一个既定目标，为提高人民的福祉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目标。总体而言，毫无疑问的是，各国政府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先事项。在面对目前的生产系统所导致的持续的极端贫困和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注重收入增加以外的其他衡量尺度自然是值得的。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人类世时代，人类影响着地球的自然系统，对幸福的追求应与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³ 随着对幸福感的研究不断前进，其在政策设计方面的效用正在逐步显现。⁴

¹ 见 Joseph E. Stiglitz, Amartya Sen 和 Jean-Paul Fitoussi, “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的报告”，请查阅 www.stiglitz-sen-fitoussi.fr/documents/rapport_anglais.pdf。

²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基本的需求(例如食物和水)必须首先得到满足，然后才会强烈追求(或专注于)次级或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安全、就业、财产，然后是交友和家庭(爱和归属感)等需求，进而是自尊和成就。最高级的需求，即自我实现，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³ John Helliwell, Richard Layard and Jeffrey Sachs, ed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Earth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2012。

⁴ 应予指出的是，快乐本身似乎鼓励人们参加各种工作和休闲活动；预计由此可形成朋友和婚姻关系以及社区参与。“快乐的情绪”可以开阔思路，提高创造力。快乐还有利于身体健康，延长寿命。见 Sonja Lyubomirsky, Ed Diener and Laura King,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31, No. 6(2005)。

三. 幸福和福祉的方方面面和衡量尺度

8. 哲学家、理论家和研究者对什么是幸福和福祉有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采用了eudemonia一词，常译为“幸福”，来形容美好的生活。这种对幸福的理解，不仅包括满足感，还包括人生的目标感、自主、自我接纳、连通性和心理的活力感。一些理论家加上了“有意义的工作”或“召唤”，将其作为幸福的重要成分。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理论者将“喜悦”和“避免痛苦”作为幸福的主要成分。⁵ 还有人认为，福祉有几个必要的基本条件，例如健康和良好的关系等。有些人将自己的意愿和目标得到满足(这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对人生的主观评价)作为幸福的基本条件。⁶

9. 衡量幸福和福祉，需要区分主观性幸福(也被称为“情感幸福”，其中涉及日常的喜怒哀乐)和“评价性幸福”(这涉及导致对自身社会地位，例如，健康、对机构的信任度和充满活力的社区的整体满意度或不满意度的生活侧面。人们普遍认为，根据主观和评价数据得出的综合结论应用于可能的政策设计。

10. 在许多国家中，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横向和纵向调查数据日益增多，给了我们机会，以经验性地验证个人看重什么，政策制定者在试图推进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最经常考虑的福祉因素是：收入(消费、财富、物质福利)、健康(死亡率、发病率)、教育(扫盲、教育程度)、民主参与(选举、表达自由)和心理感受(抑郁、享受等)。有益于幸福的关键性外部衡量因素是：收入、工作、社会和治理，以及价值观和宗教。个人因素包括身心健康、家庭感受、教育、性别和年龄。现有的广泛的经济计量研究结果证明了不同文化背景对幸福的诸多方面的影响。⁷

四. 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行动

11. 一些国家的政府一直试图以可靠的方式衡量一段时间内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目标通常是，设计相应的社会政策，避免“幸福陷阱”，如收入增加，但幸福度并未上升。⁸

⁵ Jeremy Bentham (1789)得出的结论是：指导人的行为的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

⁶ Shigehiro Oishi, “Culture and Well-Being: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Ed Diener, Daniel Kahneman and John Helliwell, ed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⁷ Leonardo Becchetti and Alessandra Pelloni, “What are we learning from the life satisfaction literature?” . Working paper No.2, January 2011,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 Italy.

⁸ 这一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理查德·伊斯特林的研究表明，虽然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自1960年以来提高了3倍，但是平均幸福指数在过去半个世纪却基本没有变化。

A. 国家行动

不丹

12. 不丹国民幸福指数概念⁹认为，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综合推进办法，并对幸福的非经济方面给予同等重视。该指数旨在为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提供政策激励，从而通过以下方式提高不丹的整体福祉：(a) 增加幸福者所占的百分比；(b) 减轻不幸福者的不满状态。具体而言，幸福指数的目的是设置一个替代发展框架，以向各部门提供指标，引导发展，按照具体目标分配资源，衡量一段时间内的进展情况，比较全国各地的进展情况。幸福指数提交给不丹区级领导人，供他们比照本区的成果审查其政策，并做出必要的修改。幸福指数自 2008 年推出以来，一直在使用政策和方案筛选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对这些工具进行扩展。

13. 幸福指数的基础是四大支柱，包括 33 项群组指标，124 个变量，九个领域。在各个领域，客观指标获得较高的权重，主观和自我报告的指标获得较低的权重。这四大支柱包括良好的治理，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正在审议的问题属于九个领域：心理健康；健康；教育；扫盲；学历；知识；价值观；文化；时间使用；良好的治理；社区活力；生态多样性和复原力；生活水平。¹⁰

14. 2010 年在不丹进行的国民幸福总值调查显示，50%的城市居民是幸福的，37%的农村居民是幸福的。总体而言，41%的人称相当幸福。年轻人相对比老年人更幸福，男人比女人更幸福。超过 10%的不丹人不幸福(达标领域不到一半)。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低下，以及缺乏心理健康。有趣的是，已经取得文凭或研究生学历的，没有不幸福的。

15. 不丹举办的福祉和幸福高级别会议¹¹得出的结论是，任何有效的政策必须与生态可持续性、公平分配和有效利用资源相配合，并应增进所有生命的福祉和人类的幸福。会议提出的政策建议侧重于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技术转让，在可再生能源、促进健康和终身学习等可持续的基础领域进行投资，支持小规模生产，累进税制，创建可持续的福祉账户和福祉进展情况综合衡量尺度，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到 2014 年围绕这些衡量尺度建立全球性共识。新成立的国际专家工作组负责在这些初步的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的系统性政策框架，并就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提出建议，从而实际执行新的经济模式。最近，不丹总理在

⁹ Karma Ura, Sabina Alkire, Tshoki Zangmo and Karma Wangdi, A Short Guide to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available from www.grossnationalhappiness.com/wp-content/uploads/2012/04/Short-GNH-Index-edited.pdf.

¹⁰ 在此，住房和资产是重要因素。《国民幸福总指数简要指南》所载的研究结果表明，“从社区角度来看，除非有适当的生活空间和体面的居住条件，否则无法消除社会排斥和歧视，也无法增强社会凝聚力”；土地和牲畜等资产对于确保体面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

¹¹ 关于讨论情况的报告见：www.2apr.gov.bt/images/BhutanReport_WEB_F.pdf。

2012年10月5日会见工作组成员时重申，目前的发展模式除推动经济增长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愿景，而且转变发展模式和走全面发展之路是必要的，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承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模式可以支撑体面的生活水平、充满活力的文化和优质教育，并得到适当的监管体制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支持。

16. 总理强调，这种新的方式本身并不妨碍发展，而是会在生态界限内促进有意义的发展，例如，支持绿色能源和有机农业。不丹将自身视为新模式的推动者，并期待着开展全球合作。不丹的倡议将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等秘书长的机制以及秘书长对2015年以后的议程的设想相联系。不丹打算在2013年6月就工作组第一阶段的工作成果作一介绍。以福祉和幸福以及发展、生态可持续性和公平分配的意义为重点的最终报告将在2014年提交给大会。该倡议将主要通过联合国来执行，将以影响政府的政策为目标。

法国

17. 法国在对2012年8月普通照会的答复中表示支持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报告¹所载以下主要建议：(a) 以收入和消费而不是生产为参照；(b) 强调从家庭的角度看问题，其中应考虑到资金转移和公共服务；(c) 兼顾考虑收入和消费与财富；(d) 更加重视收入、消费和财富的分配；(e) 把对收入的衡量扩大到非市场活动；(f) 改进衡量人们的保健、教育、个人活动和环境状况的标准；(g) 评估生活质量上的不平等；(h) 策划调查，以评估每个人生活质量不同方面之间的联系。

18. 另外，法国支持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综合起来的办法，并建议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文书时考虑到后代子孙的福祉。法国采用了两项极其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全国总需求所产生的碳足迹以及对产品消费和生产的衡量。法国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并需要新的工具以及统计委员会、联合国统计司和民间社会更好的合作和参与。

意大利

19. 2010年，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及全国经济和劳动委员会发起了一项衡量公平和可持续福祉的倡议，该项倡议将在2012年12月发表一份报告后完成。这项倡议确定了12个衡量福祉的领域，并启动了公开咨询活动。这些领域包括：环境、保健、经济福祉、教育和培训、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社会关系、安全、主观幸福感、景观和文化遗产、研究和创新、服务质量以及政策和机构。在线讨论显示，保健、环境、教育和培训以及服务质量被认为最重要，而经济福祉、生活满意度、政治参与、对机构的信任和安全则不太重要。具体领域内的指标包括城市空气质量、调整后人均可支配收入、恶劣的住房条件、参加早期幼儿教育、就业

人口中对其工作感到满意的人所占份额、普遍信任、志愿工作、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选民投票率以及对议会、政党、司法系统和地方机构的信任。

日本

20. 日本内阁府一直在对福祉问题开展研究；内阁府设立了衡量福祉委员会，公布了建议的福祉指标，¹² 于 2011 年 12 月举办了亚太衡量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会议，¹³ 并开展了第一次生活质量调查。衡量福祉委员会由有关专家组成，并由主管经济、财政和社会结构的总务长官及日本经济和社会研究所共同提供支持。如日本“新增长战略”所述，该委员会是为促进增长和福祉方面的研究而设立的。衡量福祉委员会在 2011 年 12 月发布的报告中建议了若干福祉指标。

21. 2012 年 3 月，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生活质量调查。调查项目包括：(a) 幸福感，(b) 相互依存的幸福，(c) 生活满意度，(d) 情感平衡，(e) 在生命中不同阶段的满意度，(f) 对生活环境的客观评价，(g) 生活环境，(h) 焦虑，(i) 安全，(j) 社会支持，(k) 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l) 社交频率和福祉的其他方面。

卡塔尔

22. 卡塔尔赞同幸福不仅仅取决于收入的观点。该国《2030 年国家愿景》和《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旨在根据较高的道德标准维护公正和充满关怀的社会，并在不牺牲其传统文化及其阿拉伯和伊斯兰特性的前提下改善该国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卡塔尔致力于制定社会保护制度，该制度维护其所有公民的民权，确保他们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并保证他们获得足以维持健康和有尊严的生活的体面收入。该国目前的努力侧重于加强家庭凝聚力，扩大社会安全网络，以及修改家庭法，以反映出国内社会变革和卡塔尔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做出的国际承诺。此外，卡塔尔还采取了必要措施，帮助妇女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支持家庭稳定并为有职业的妇女提供更好的支持。卡塔尔重点通过加强体育和文化加强该国公民(尤其是青年)的身心健康和智力健康，体育和文化都是促进健康和幸福的因素。

¹² 本节根据日本对 2012 年 8 月普通照会的答复编写，包括日本衡量福祉委员会题为“衡量国民福祉：拟议福祉指标”的报告(2011 年 12 月 5 日)和生活质量调查数据的初步调查结果(2012 年 3 月)所载信息。这项研究由日本内阁府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福祉研究股负责协调。

¹³ 亚太衡量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在新德里举行，是为筹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第四届世界统计、知识和政策论坛而举行的系列区域会议之一。这次会议聚集了大约 200 名具体关注该领域的区域决策者、统计员、学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这次会议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日本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经合组织、韩国统计局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与经合组织发展中心和 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21 世纪统计伙伴关系)秘书处联合举办的。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3.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领导的衡量国民福祉方案致力制作和公布一套已获得接受和信任且有助于人们了解和监测国民福祉的国家统计资料。¹⁴ 该方案的第一阶段为 2010-2011 年的全国性辩论，举行辩论的目的是就对人们重要的问题和影响其福祉的问题征集意见。辩论的结果是确定了一系列建议衡量的领域，包括：主观幸福感、健康、教育和技能、个人财务、关系、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做什么、经济、环境和治理。2012 年 7 月公布了第一套实验性年度国民福祉指标。衡量国民福祉方案将持续到 2014 年，在此期间这套指标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B. 区域倡议

欧洲联盟

24. 欧洲联盟强调，除了促进基本人权被视为福祉的关键构成部分之外，不丹提出讨论的幸福的 4 个层面，即，幸福和福祉、生态持续力、公平分配和有效利用资源，是欧洲联盟目标的核心。欧洲联盟还指出，要想监测国家和全球一级在所谓“普惠性绿色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就必须根据国际可比数据制定指标，这些指标必须在一个概念框架中确立，并根据明确规定的标准选定。

25. 欧洲联盟注意到制定有助于衡量社会总体福祉的若干新指标以及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力衡量标准的倡议，比如，欧洲联盟委员会 2007 年题为“超越国内总产值”的高级别会议，以及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关于衡量生活质量的工作。欧洲联盟根据环境经济核算体系通过了欧洲第一套环境-经济账户。根据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报告¹的结论，这项工作涉及当前和今后福祉的很多层面，并将各种客观和主观衡量标准结合在一起，以求加深我们对各种生活质量和福祉概念之间关系及其与可持续能力之间联系的理解。欧洲联盟强调，需要在制定指标方面开展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贫穷、资源枯竭、保健和生活质量等全球性挑战；然而，虽然目标明确，但制定和推广使用包括与国内总产值同样显著的环境和社会进步在内的新指标并非易事。

26.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指出，大会第 65/309 号决议正好符合该委员会自身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方针。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低碳绿色增长路线图提供了一套全面的政策选择。亚太经社会正在启动制定绿色增长指标的工作。泰国政府公共政策发展办公室与亚太经社会于 2007 年合作举办的幸福与公共政策国际会议探讨了幸福与政策的相关性。这次国际会议主张制定幸福标准和重新制定公共政策计划，以加强个人和社会幸福感。在这次会议上得出的主

¹⁴ 依据是联合王国对 2012 年 8 月普通照会的答复和 Jen Beaumont, 编辑, “衡量国民福祉: 关于拟议领域和衡量标准的协商对策的报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 2012 年 7 月。

要结论中，有两个结论是收入带来的幸福边际收益递减，以及社会比较对人们的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这两个结论为旨在为较穷群体而不是较富群体创造收入以及旨在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和降低收入差距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理由。这次会议查明了两项决定性的挑战：人人享有正式就业和穷人的财富积累机会。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的两个最便利的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财政支出：再分配财政政策应对市场和改革刺激措施效率低下的问题，财政支出侧重于提供经改善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保健制度。

27. 亚太经社会指出，成员国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才能制定与政策相关的幸福和福祉指标，特别是那些与经济增长质量有关的指标。各区域委员会可探讨进一步执行支持成员国的任务，具体方式包括：(a) 征集和分享促进福祉和幸福的经验；(b) 更好地了解福祉和幸福的决定因素；(c) 对有关公共政策进行研究；(d) 克服与制定福祉和幸福指标有关的方法问题。

28. 亚太区域若干国家已经制定了国家福祉指标，其中包括客观和主观构成部分。这些指标从总体幸福感、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受教育和培训程度、社会关系和工作-生活平衡，到生活环境和治理。不过，几个国家政府警告说，很难制定明确的幸福指标。有些成员国注意到通过促进人权、社会保护和家庭稳定改善综合福祉的努力。发展工作中显然需要新的经济模式。总体而言，“福祉议程”被视为 2015 年之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C. 联合国系统的各项倡议

29. 几个联合国机构已表示支持衡量福祉，并与开发署交流了看法，这些机构指出，不丹国民幸福总值倡议补充了开发署的人类发展办法和人类发展衡量。开发署已鼓励不丹将国际专家工作组的工作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和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的工作以及联合国发展集团启动的系列专题协商和国家协商联系起来，从而对审议 2015 年之后发展议程的工作作出贡献。

3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强调，粮食保障、清洁饮用水、基本能源、保健服务、住房、卫生、绿色交通和教育是人类福祉不可或缺的，并指出，仅靠国内总产值增长无法确保加强平等、减少贫穷，也无法确保粮食保障。不过，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于改善教育、保健和营养等生活质量的某些方面而言是必要的，但仅靠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做到这些。这可能意味着，如果辅之以有利穷人的财政、保健、教育和其他循序渐进的发展再分配政策，国内总产值增长就可改善福祉和幸福的一些主要构成部分，但并不保证这一点。粮农组织警告说，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往往没有考虑到可持续性问题，包括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31.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赞同不丹的倡议，并强调幸福作为一项社会和政治目标的重要性，要实现这项目标需要采取社会、政治和经济措施。考虑到全球大部分人口为穷人，住在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是要强调公平和包容性的农村发

展，包括相对小农生计制度的发展。农发基金强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克服贫困和粮食无保障问题，以及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人口切实追求幸福的前提条件。

3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认为，社会包容性、公平、工作和教育对于人类福祉和幸福尤为重要。人人享有高质量的教育是人们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些技能和知识是人们获得体面就业和增强创造自己的未来的能力所需的。教科文组织提议把人人享有高质量教育以及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福祉的可能指标，并强调文化、社会凝聚力和文化间对话作为社会发展重要标志的重要性。教科文组织主动提出为联合国系统制定福祉和幸福指数提供支持，该指数源于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应被纳入 2015 年之后的发展框架。

33.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重点制定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幸福标准。妇女署建议了具体领域按性别分列的若干指标。在人身安全方面，建议的指标包括：15 岁以上的妇女中受到亲密伴侣或其他人的人身暴力或性暴力侵害的人所占比例；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发生率；残割女性生殖器和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发生率；凶杀率；犯罪率；冲突期间性暴力行为女受害者的比例。在经济保障方面，建议的指标包括：贫困家庭的妇女与男子的比率；劳动力参与；失业率；妇女拥有的公司所占百分比；可获得信贷的人口所占比例；工资方面的性别差距；育儿假长度；养恤金福利的普遍程度以及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公约的情况。在时间的使用方面，建议的指标包括：在无薪家务工作、带薪工作、休闲和个人护理方面花去的平均时间。在保健方面，建议的指标包括：孕产妇死亡比率、在熟练的保健专业人员帮助下出生的新生儿所占比例；青少年生育率；妇女避孕普及率；堕胎的合法性；报告健康状况不良的人所占百分比。还建议制定几项治理和问责方面的指标，包括遵守非歧视性的法律。妇女署指出，关系方面的指标和对妇女在社会上的作用的想法，包括对妇女参与环境可持续性工作的看法很重要。在机构和参与方面，妇女署建议制订注重妇女参与家庭、社区和政治生活的指标。最后，妇女署指出，在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妇女报告的幸福水平相对较高，并建议制订若干心理健康指标。

34.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志愿人员方案)强调，应该认识到志愿服务是一种强大和可再生的资产，也是任何新的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这种服务是减少社会排斥和促进公民参与的一个途径。对福祉进行评估必须考虑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广大环境之间的互动。志愿人员方案呼吁增加志愿者行动方面的指标，并在幸福和福祉的社会层面上考虑到社会资本、公民参与、治理、社区活力和复原力。

35. 联合国各实体指出，仅靠国内总产值增长无法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并对不丹的福祉倡议表示欢迎。不丹国际专家工作组今后的工作可与开发署的人类发

展办法、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的工作以及联合国发展集团启动的系列专题协商和国家协商挂钩。

36. 联合国各机构已开始重视福祉的若干方面，着手点是获得粮食和基本服务的机会、教育、文化和志愿服务对于有活力社区的重要性。各机构指出，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需要公平和包容性的发展。有些机构强调，应把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贫困和粮食无保障方面的目标，视为全球一级追求幸福的先决条件。

五. 国际和区域对福祉情况进行的主要调查及结果

37. 国际和区域两级都进行了衡量福祉的努力。¹⁵ 一些较有影响的调查包括：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每年在每个国家对 1 000 人进行的抽样调查，目前包括 160 个国家)、世界价值观调查、欧洲社会调查、欧洲晴雨表、亚洲晴雨表和拉丁美洲晴雨表以及许多国家进行的调查，包括不丹、意大利、日本、南非、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其他国家。调查通常询问答复者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

38. 如前所述，关于幸福和福祉的研究一直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现有数据有限而且零散，长期性幸福度趋势研究几乎不存在。只有 4 个发展中国家被列入 1981-1984 年进行的第一波世界价值观调查，大多数国家开始被列入 1989-1993 年进行的第二波调查。拉丁美洲晴雨表是第二大的主要数据来源，自 1995 年以来，几乎每年进行。南非有一项生活质量趋势研究。然而，这些调查之间存在着可比性的问题。

39. 经合组织的“更好生活倡议”汲取了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的建议，目的是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是什么力量推动人民和国家福祉的，以及需要做些什么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进展。该倡议依据了 11 个侧面：住房、收入、就业、社会、教育、环境、公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兼顾。经合组织 2011 年题为“生活过得怎样？衡量福祉”的报告做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这是首次试图在国际范围提出一套最适宜的具有可比性的全面福祉指标。经合组织还制定了“你的美好生活指数”，以支持决策，改善生活质量。¹⁶

¹⁵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了两项可增进幸福的战略。一是降低人们的期望值，这往往通过宗教和精神生活来实现(这与传统型社会相联系)。另一种途径是通过现代化，以扩大人们物质、政治和社会机会，通过经济、政治和价值体系的转型来实现。

¹⁶ 你的美好生活指数目前载列了 34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巴西和俄罗斯联邦等关键的伙伴国的简况，涉及 11 个福祉专题，最终还将包括经合组织其他主要的伙伴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更多详情见 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

4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试图摆脱简单依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福利的标准，其中包括调整后的实际收入、寿命长短和教育程度。已发现人类发展指数和各国生活满意度两者在排名方面存在差异。

41. 还进行了各种独立调查，制定了各种指数，以评估福祉的总体情况。例如，新经济学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智库，根据关于预期寿命、幸福体验和生态足迹的全球数据制定了一套指数。所谓的“幸福星球指数”根据每个单位的环境投入所产生的长久和幸福人生的数量对各国加以排名。2012年幸福星球指数排列了151个国家，也是该指数第三次公布数据。¹⁷

42. 根据盖洛普千年全球民意调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的顺序为：良好的健康状况；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工作；自由；没有战争、暴力和腐败；生活水准；宗教和教育。调查还指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高收入、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特别是那些社会高度平等、充满信任以及高质量治理的国家。1975年和1997年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约40万人进行了幸福情况调查。情况表明，幸福与绝对收入、福利国家的慷慨和预期寿命成正比。成反比的包括平均工作时间、环境退化、犯罪、开放贸易、通货膨胀和失业。¹⁸

43. 研究表明，在个人层面，收入与幸福有关，但除了足够收入以外，其他因素（例如有良好的婚姻和教育）似乎变得更加重要。各国的情况是，似乎不会因为更加富有而更加快乐。幸福感在年龄段上呈U型，中年人报告说不够幸福，但老年人感到较为幸福。妇女报告说享受了比男子更多的福祉。经查明，生活中两个最大的负面因素为失业和离婚。生活中临时的正面和负面因素（如加薪）随着人们习以为常（适应），而逐渐淡忘。相对的事情也很重要（例如，自己与别人所得到的待遇有何不同，自己的收入与他人的差距，据报，工资不平等降低了幸福感），但这方面的影响不算大。

44. 在过去的25年里，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容忍度的提高，增强了全世界的幸福感。在某些刚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幸福感明显下降。自1981年以来，在52个提供了重要的、具有时间系列现有数据的国家中，有40个国家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有所提升。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丹麦、冰岛、瑞典、挪威和芬兰在主观福祉方面排名靠前。¹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排名，尽管这些国家的财富程度以及善政程度较低，这也许能从强有力的社区网络和信仰宗教人数众多来加以解释。

¹⁷ 查阅：www.happyplanetindex.org/about/；哥斯达黎加、越南和哥伦比亚在幸福星球指数排名居首。

¹⁸ Rafael Di Tella 和 Robert MacCulloch 所著，“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s an Answer to the Easterlin Paradox?”，《发展经济杂志》，vol. 86, No. 1, 2008年。

¹⁹ 根据2000年世界幸福数据库的数据，按照从0到10尺度排列的平均数，丹麦评为最高级（8.2），津巴布韦最低（3.3），见 www1.eur.nl/fsw/happiness/。

45. 对欧洲联盟的新成员国、即后共产党国家的调查依据了欧洲晴雨表、对申请加入欧洲联盟的候选国进行的调查(2001-2004年)、欧洲晴雨表对欧洲联盟成员国的调查(2005-2007年)以及世界银行发展指标,并比较了经济和政治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对民主的满意程度)。2001年后的趋势是积极的,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与欧洲联盟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这些起初福祉程度较低的国家据报提升了福祉,这有力地证明了趋向一致是有可能的。对出现这些趋势的一个解释也许是,由于参与度、自由度和民族自豪感提高,民主促进了幸福感。然而,由于欧洲社会经济危机,预计生活满意度有所下降,例如罗马尼亚,自2008年以来呈现了持续下降趋势。²⁰

46. 总体而言,直到最近,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时间系列数据一直只是来自高收入国家。数据显示趋势走平,由此可以假定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主观幸福感一直维持不变。实际上,主观幸福感略有增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大韩民国、南非和土耳其)的幸福感稳步上升,而生活满意度显示最初略有下降,而后急剧上升。²¹

六. 国际社会对福祉看法的分歧

47. 应铭记,各种文化对于幸福和福祉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至于幸福感的不同概念本身,也显示了对幸福的不同信念。例如在一些语言中,幸福可能与幸运和运气相关联。此外,在一些区域,人们可能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不愿意报告其幸福感和福祉的情况。此外,在解释全球关于福祉的报告中存在的国家差异时,还有许多重要的方法问题,例如答复方式和自我介绍的动机,以及记忆和显性偏见等问题。²²

48. 然而,由于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衡量尺度日益增多,而且可能彼此相互关联,因此对福祉作出比较越来越容易了。研究表明,对个人生活进行评价时,幸福感的国际差异要大于对临时性的福祉程度作出情感评价。因此,尽管有文件证明,不同时间不同文化背景下主观评价的变化有所不同,但在生活评价方面所产生的

²⁰ Sergiu Baltatescu 所著,“A Success Story? Happiness in the New Post-Communist EU Member States”, 罗马尼亚 Oradea 大学工作文件, 2010年11月20日。

²¹ Ronald Inglehart 所著,“Faith and Freedom: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ays to Happiness”, 载于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Ed Diener, Daniel Kahneman 和 John Helliwell 编辑, (牛津, 牛津大学, 2010年)。

²² 见 Shigehiro Oishi 所著,“Culture and Well-Being: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载于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大部分国际差异一直与社会、体制和经济环境有关，而不是评价这些差异在方法上有所不同。²³

49. 例如，欧洲价值观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²⁴以及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表明，各国在情感平衡方面，情况只是略有不同，例如快乐、担心、抑郁、悲伤和愤怒。然而，在生活条件评估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国际差异。盖洛普民意调查进行的头三波调查请来自 140 个国家的民众运用“坎特里尔自我定位梯度表”从 0 到 10 中选择一个数字来评估其整个生活。情况表明，平均数字从满意度最低的国家(包括多哥、布隆迪、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的 3.3 到满意度最高的 4 个国家(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7.7 左右。此外，盖洛普数据还表明，对于那些处于生活评价梯次最低的国家而言，其状况并不是由于平均收入较低，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物质上处于不利状态的同时，还伴有社会问题。²⁵

50. 研究表明，其他变量，如社会信任、工作质量、选择自由和政治参与以及增加社会容忍均已被证明比收入更重要。²¹ 由于民主化和容忍扩大了人民选择的范围，因此提高了福利。不宽容的社会规范可能会限制人们的生活选择，从而减少人民的主观幸福感。总体而言，凡生活在经济发展、自由、法治和善政的国家的人民，幸福感比较高。财富(收入)、自由(经济和政治)、和平、司法(反腐败、法治)、平等(收入和性别)以及教育等社会特征的状况，可以解释各国平均幸福差异中 75% 的因素。²⁶

51. 在拉丁美洲，与幸福与否最有关的因素按照其重要性排列为：经济满意度、朋友、工作、健康和住房。在缺乏公共安全网的情况下，友谊是穷人重要的应对机制。社会关系在所有区域都是重要的，答卷者似乎都看中得到他人的支持以及给予他人支持。在所有区域，生活满意度取决于社会支助，来自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答卷者似乎社会经济地位较为富裕，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民众则更加重视社会支助。个人方面适应增加收入的好处，同时也适应犯罪和腐败趋势上升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健康状况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而言，各国情况显示并无关联。例如，肯尼亚对自己健康状况表示满意的百分比高于美国人，而在公众对保健系统信任程度排名表里的 115 个国家中，美国排名第 81。一些国家健康水平极低，但幸福感程度却较高，不过，在这些国家，越是健康的人越幸福。

²³ John Helliwell, Christopher Barrington-Leigh, Anthony Harris, Haifang Huang 所著，“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载于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²⁴ 关于福祉的数据主要来自分五次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84 年、1989-93 年、1994-99 年、1999-04 年以及 2005-07 年)。

²⁵ 见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的序言, Ed Diener, Daniel Kahneman 和 John Helliwell, 合编(2010 年, 牛津大学, 牛津)。

²⁶ Ruut Veenhoven 所著“How Universal is Happiness?”载于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52. 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感对于福祉极为重要。然而，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联合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任感日益下降。同时，人际关系也呈减弱之势，这体现在日益增多的独居、交流困难、恐惧、不信任、家庭破裂和社会参与减少。在几个高收入国家，相当多的人感到有压力，患有忧郁症，包括有些年轻人在学校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此外，由于不平等现象不断增多，加剧了社会紧张，破坏了幸福感。不过，针对不平等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问题开展了实际工作，但结果喜忧参半。

七. 结论和建议

53. 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益处是，除了确保满足基本需要外，还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并增加收入，但这不一定能提高很多福祉。调查显示，总体安全感对于人民的福祉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职业保障、牢固的亲友网络、言论自由和其他因素。因此，各国政府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有必要考虑除了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以外，促进福祉的诸多方面。目前的调查表明，有必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以确保高就业、高质量的工作、建设具有高度信任和尊重感的强有力社区、参与型治理、更好的身心健康、对家庭生活的支持以及普及高质量的教育。

54. 一般而言，应鼓励各国政府(一) 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不是衡量福祉的唯一指标；(二) 把经济和社会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三) 制订具体政策来保护环境；(四) 制定福祉指标，以指导政策设计和监测，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55. 应鼓励各国政府：

(a) 考虑采用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福祉概念，采行新的经济模式，即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侧面。

(b) 运用经过认真构建的关于幸福和福祉的定期、大规模数据，将其作为改善宏观经济决策以及明智地提供服务更为适当的指数。

(c) 与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广泛协商，查明哪些福祉指数有可能表达对实现和长期保持社会进步的方法的共识，并给予优先考虑。

(d) 指导国家统计局考虑扩充国家统计系统中涉及福祉的内容。逐步建立一套评价系统，按照每个单位的公共净支出所产生的幸福感的变化，对政策作出判断。

(e) 确保为实现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人民以及中高收入国家被排斥群体的幸福，提供起码条件，如(一) 获得食物和基本服务；(二) 获得基本人权和社会保护；(三) 在实现更广泛的福祉目标之前，减少不平等现象。

(f) 进行推动，以使不丹国际专家工作组未来的工作与以下方面联系起来，即秘书长现有倡议、开发署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后续机制以及相关领域学术和民间社会的举措。